

民國十一年十一月
梁漱溟先生在晉講演筆記

山西省教育會雜誌臨時附刊

梁漱溟先生講演筆記目錄

中國民族今日所處之地位

合理的人生生活

我從少年到現在的行事

印度佛教於流傳到外國的佛教之不同

如何奠定現在的國家

如何可以使人行的行為合理

中西醫學比較觀

吾人的生活與家庭

中西兩方教育所注重之不同

今日之中國與工業

中國民族今日所處之地位

在國民師範學校

這段話差不多是我研究東西文化問題的一個小小結論。

總括來說，就是，中國民族今日所處地位與前數十年不同了。所以不同，

所以要變成現在這樣，完全是文化的問題。一方面固因國內的變動，而尤其重要的的是外面別國的變動。西方民族因為有那樣的文化而成那樣的局面，漸漸的使中國地位也受很大的影響。看明了這層，然後可以曉得我們應當持什麼態度，用什麼做法。

我們先說前數十年的地位。先看當時國外的情形，次看國內的，再將二者比較着看，即可明白當時自己的地位。

那時的中國情形，無論那一方面都與現在不同。如學校的設備，自然科學的知識，現在雖然都還幼稚，但已非那時所有的；政治方面也總算已由君主改為民主，這是幾乎全非昔日所有的。昔日知識方面非常欠缺，物質方面全無創

造，社會生活方面全受威權的支配；而同時在西方人則已經早有種種的大成功，物質方面的發明非常豐富，尤其使中國人震驚的是軍械，社會生活方面則有「由比較多數的人協作組織」的政治。那時的中國人，由他們看來，直是一個半開化的民族；無論物質方面或知識方面，他們都有可以任意處置中國的能力。所以當時瓜分之說，實在並非無根的恐怖，確有那種形勢。他們那種組織很完密的國家，對付我們這樣散漫而伏處威權底下的民族，的確是可以任所欲爲，而我們則任何方面，百不如人，這不是半開化的民族是什麼？

所以如此不同，全由於文化的各異。文化沒有別的解釋，只是人類種種生活方面的樣法。換一個說法，就是生活的種種方面，雖甚複雜而各有其趨向——這趨向就是文化的路子。這話是反對另一說法而言。另一說法，以爲人類文化的路子只是很長的一條，而西方人走得比較多些，這些，中國人走得比較少些，近些，即所謂開化與半開化，進步與未進步之說。我以爲不是如此，是根本

不一條路。如果人類文化是一條路，那末，雖然兩方走得遲速不同，却是無論慢到如何程度，終久會有走到的一天，這是此說當然應有的推論。但事實上却全不如此。比如有人到山西來，順着京漢路的方向，自然會到石家莊，若另一個人全然沒有向這個路向，就永遠不會走到。中國的文化也是如此，同西方全非同一路向，並不只是能力的問題。中國真正的精神，是喜歡從容優游，不願意急遽猛進。中國的文化全是根據這種精神來的。所以我們竟可斷言，假使西方的物質文明不來到中國，中國永遠不會產生聲光化電那些種種的物質文明。

這個問題，在短時間的講演中很難申說明白。簡單來說，西方人的生活是求諸外的，中國人是求諸己的。物質方面，西人本其向前的精神，有很大的征服自然的成功。最大的如火車輪船飛艇等等，却是對前面對外面去下手。社會生活方面，對於在上的威權有反抗推翻克服的精神；什麼君主教皇，都被他們向前的精神所征服。中國人則只求自心的滿足，居陋室食粗糲而怡然中心自得

；即或有不甚自得，也只是自相譬解，安分忍耐，決不求什麼向前向外的改革。這是物質方面。說到社會生活方面呢，也是一味忍耐，對於任何橫暴的威權無積極的反抗，如子女臣民之對於家長及君主，都是屈已讓人的態度。中國人本了這種精神，物質方面固然毫無成就，而社會上的威權也永遠沒有摧破的一日。

西方人因有那種的精神而取得那樣的地位，中國人也就因這種的精神而取得這樣的地位。但想不到數十年來，居然大變了。這種變遷出於我們自己的很少，如政治變遷，雖是很大的，但實際上，還是始終不曾運用得好，因為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還是老脾氣。最大的原因還是外面的情形的激動。

我們看西方人：

(一)精神方面 此刻西方人實在已到筋疲力盡的樣子了，因為向外的路子走的太遠太久，很感困苦。走這條路的時候，理智作用最盛，分別，計較，揀

擇，使科學有種種的成功，但在精神方面很使人感疲乏困苦。他們看自然界不是圓圖有趣的一個整的東西，只見其零碎瑣屑，爲一些很小的質點所構成的。這與人類生活本性很相刺謬，如此嚴冷非其所樂。人與自然由對抗而分離隔絕，成爲兩截，久而久之，即成爲人類精神上的大苦痛。

(二)社會生活方面 推翻威權固是他們很大的勝利，但因處處嚴別物我，好言對待，而人與人間界限太深，家人父子都是計算的法律的關係，沒有一點情趣，也是人生的大苦痛。人類本性喜歡富於情趣而惡刻薄寡情。寡情的結果常致生活不得安寧。西方人走他那路太遠了，現在圖窮匕首現，一切苦痛都呈露出來了。所以現在已經在那裏要求如何的改換這種路向，這實是文化變遷要開端的時候了。照我就他們科學哲學各方面看來，像是要變到中國的路子上來了。

(三)經濟方面 機械發明的結果，生產品日益加多，使西方經濟方面生很

大的變遷，由消費本位的變到生產本位的。中世紀時候，所有生產機關都是小規模的，手工業的，家庭工業的，小資本的；視需要的量而生產，很是安穩。從機械發明以後，手工業變成機械工業，家庭工業變為工廠工業，小資本的變為大資本的，消費與生產相當的變成多量的生產。此時資本家互相競爭，生產過剩，結果有些資本家不能獲利，以致工廠停閉，工人失業，造成經濟的恐慌。這種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經濟使社會很不安寧，乃發生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的對立。以後要改變到如何樣子雖尚難斷定，但其將由生產經濟變為消費經濟——以社會為本位的經濟，則可斷言。這一點也是西方路向所必至，為中國所不會發生的。

現在我們再看中國：

中國從前的瓜分說，大約不對。照此刻經濟情形看來，不會有可使中國滅亡的原因。因為外國從前那樣剝削他民族以富厚自己的政策，已為大多數西方

人所拋棄。他們現在都只能各顧自己社會的改革，無暇侵略別人。所以從前中國怕亡之說，至今情勢已變。而精神方面，我們又已認清中國文化爲世界文化變遷所趨向，只要我們能好好努力，一定可以爲中國人爭光榮。

以下簡單言其作法：

(一)西方人在那條路上所成功的，我們也應當做到，否則很不利。中國人素來太屈伏於威權之下，根本上是做人的缺陷。完滿的人格，不應有個性的屈伏。政治方面也很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。這就是要大家一變以前完全退讓的態度。近來野心家所以能自由搗亂，主要原因即在一般國民對於政治太無興味，太少注意，只會避亂，不會干涉。如果大家永遠不取這種保持自己權利，反抗別人侵略的態度，即對特殊勢力十軍閥爭持的態度，那就無論如何也永遠不能奠定我們所要運用的政治的基礎。我以爲國民師範諸君將來最急要的责任，即在如何提起國民的此種精神。

(二) 家庭很應保持。我們數千年所固有而西人所無的好處，就是情趣的生活，而家庭是培養情趣最好的地方，所以應該好好的保持。

(三) 物質方面，如果不能征服自然，即要受自然壓迫，如水旱天災之來即無法抵禦，這也必須追步西方的。因此

(四) 科學知識的開發也非常重要。最後尤其重要的是

(五) 中國固有文化的研究，但這自然是少數學者的專責。

合理的人生生活

在第一師範學校講

這個問題似乎是人人都當留意的，無須解釋。但是在什麼時候的人最要求解決這個問題呢？這在青年時代，尤其較優秀的，愈覺這種尋求的急切。我在中學時即如此，有幾個朋友也如此。後來到北大，那邊有幾個同學也如此。都是感覺煩悶，因而發生種種奇異的思想，甚至自殺。恐怕這邊諸位中或者也許有這樣的，所以把這個問題畧說一下。

大約要說這個問題，與生理心理方面很有關係。一個人身體發育將要完全的時候，不知不覺有種種不寤貼的情境。過了這一陣即將漸漸復歸平靜；或是問題稍得解決，亦可漸歸平靜。大約天資較高的，此等現象較甚。據我個人的經驗，在這時候，很想求得自己所要求的人生生活，很想打量打量，不願模模糊糊的過下去。此中多少含有一點與衆不同的意思，很容易看着庸衆生活的討厭。此時出世思想甚易萌動，有許多朋友都如此，要遁跡空門。這種念頭大約在自殺念頭以前。總之他願意與別人不同一點，不一定拘什麼方式，如想成英雄偉人也即是。這在男青年格外的多。想出世多少是不合理的，但除非最親切的師友，不容易勸轉這種念頭。凡是特殊的生活，其性質總帶不合理的意味，如想求道求仙或成偉人等等。這與知識關係較少，與情志方面關係較爲深切，所以由特殊人生生活的傾向到合理的人生生活之轉變，很非旁人所能爲力。雖然也有永遠持其特殊人生生活態度，但大多數都能由激越轉入平實，這實在是

好現象。由激越轉入的平實，方爲真正的平實，否則恐怕是凡庸。

凡是想做特殊生活的，根本都是一個淺。他太重視大人物，很爲大人物所引誘。不但這個，無論什麼財貨，聖賢，仙，佛，功業，學問，只要看上一樣東西，便都是一個淺。我們希望人人都有圓滿的生活，如果你要做特殊生活，便是希望有加於人。這根本是侮辱自己的人類，凡是人類都應是一般的，我們只應求一個「人的圓滿」，同時也希望人人都得一個「人的圓滿」。如果聖人的意義是超加於常人的，那聖人也就是不必要的。我們心目中的聖人，只是一個「人的圓滿。」又平常人喜歡講道德，在吾人意思，就是合理的生活；如果以爲道德是超於常人的，我們也就同樣的排斥。總而言之，激越是我們所歡迎，但希望他能歸於平實。

我們說別的生活不合理，那麼，合理的生活有沒有其積極的主張呢？有的。方才說，沒有一物可以看得上，這就是沒有安排計較，這就是合理的人生。

活。我們只應順着我們的本性去走。這須待解釋，就是要問，吾人在生活中是怎麼回事？何以使我們如此而不如彼？這個支配我們行動的心理作用，是直覺而非理智。我們平常所傾向的，多是合於我們脾胃的意味；所以能領受這個意味的，就是直覺作用，不是理智作用。如果看得上一種東西而安排計較着去走，就會漸漸遠離了我們原來生活的路子。說淺顯一點，就是，粗莽而任天真的人，生活比較是合理的。若處處抑制情感，事事安排計較，反到錯誤愈多，我們所謂道德，決非先有客觀的道理存放在那裏，然後我們人遵循着去走。這種客觀的道理，是沒有的。我以為只要任聽直覺的衝動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都是對的。各時代各地方都有道德倫理等等的名詞，但我們求其根本基礎，差不多全在直覺，就是平常喜歡說的良心。譬如某人作了一件好的事情，我們看見或者聽人稱道，便立刻有欣羨贊歎之感，甚或感極墮淚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這就因為我們自己根本上喜歡這樣，不是誰人能教給我們的，這是一種本能。理

智是待教的，直覺不待教，道德不待教。要求合理的生活，只有完全聽憑直覺。又如聽見惡人做惡而憤怒，粗莽的就恨不手及其人，其感情較常人格外激烈，因為他比較少受社會上種種複雜習俗的薰染，所以他的天生的反感格外容易引起。只有完全聽憑自己真實的真誠的不自欺的直覺，才有合理的生活。最對的莫過於自己直覺的認識。但如何使直覺為真誠的，很應注重。

一個人，只要能完全聽憑他真誠的直覺，他雖然不希望成一個大人物，但是他裏面有真實的氣力，自然有作大事業，成大學問的可能。凡是成大事業，成大學問的人，都是憑他裏面的興味，衝動，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。

我從少年到現在的行事

在省立第一中學講

在未講以先，我要對大家聲明幾句話。我至今始終是一個中學生，我中學畢業後並未入過別的學校，儘可以同諸位認同學。今天我到這裏來，不願意用高深的學理，很大的問題，或是嚴重的教訓向大家講，我願意把我少年時代在

學校中家庭中的行事告知諸位，或者比較有趣味些。

先講學校一面。我十四歲入當初順天高等學校的中學班，住了五年半。當時性情稍好古怪，有誇大狂，想做大偉人，總想由我一個人來擔任國家的事。這並不是隨便去想的，認得很真切，簡直好像已經成了偉人一般，很傲慢，不大喜歡同別人說話。這種認真的性情，或者是我的好處。由認真而要求一條準確道理而秉持之，於是胸中覺得自己氣力非常充實，以爲的確可以做人；所以雖然行徑古怪，却是我的確有我的道理。這大約是可以使我進步的一種好處。

十六歲時，結交了三個朋友，一個廣東人姓姚的跟我同歲，一個北京人姓王的十七八歲，一個福建人姓廖的十九歲，四個人常常互相砥礪切磋，確是一夥要打點正經主意的朋友。彼此不喊名字，請年紀最長的廖大哥按着各人最大的毛病，替各人定一名字，以相呼喚，他名我爲「傲」，因爲我性情太驕傲；名姚爲「暴」，「因他太急躁」；名王爲「懦」，「因爲他太和平，像是很庸懦」；而廖大哥

自名曰，「惰。」其實他並不惰，他未免太客套了；別人的名字都定得很對。

後來思想稍有變動，同他們幾位稍稍疏遠起來。因為我本着我的誇大狂，想成一個大人物，但又自知此頗不易，須有相當的修養，而那時大家互相砥礪的時候，有點偏重謹慎，我就嫌他們太拘泥。其實這於我未嘗無益，不過當時一個新的朋友初見即告我，要做大人物即不當謹厚。這個人有比較高一點的人生哲學思想，他喜歡看佛老書及譚復生的「仁學。」我很迷信他，崇拜他，呼之為師。他在校中行事比較的古怪，大家都不高興他，而我獨格外同他親近，所以同舊朋友不覺漸漸疏遠了。

十六七歲對於政治很有興趣，喜看關於政治的書，喜談政事，並且已經作許多的政治的理想。那時很迷信政黨內閣。當時國內有立憲及革命兩派，我很傾向立憲派。此時又有一個朋友，與革命派很有關係，我常同他各為長文以相爭辨。並且各以文章示人，請人批評。當時我所以反對革命派，即以爲立憲與

革命二派在政治上效力相同，而革命派則對於社會秩序大有不利；並且我對於革命派的人物也很不信任。那時我又對於自己非常的悲觀，幾至自殺。那位與革命派有關係的朋友，知道我雖主立憲，却是純粹的真意，並無別的關係，就拉我入同盟會。

十九歲作報館生活。看見一部很舊的幸德秋水著的社會主義精髓，很引我注意。雖然不加入社會黨，但自己仔細思考，確悟產業私有制度的罪惡。私產是引誘或逼迫人墮落的根原。這個意思，我認的非常真切，一切自己的行動感情，完全受這個思想的支配。覺的坐人力車也是一件很不忍的事情。記得有一次在街上看見兩個巡警，用白繩牽着一個小偷走，我看了非常的憤怒，以爲這全是私產制度的罪惡，與他何干，愈想愈氣，直欲奪而釋之，這個時候，我覺得是做人最真實的時候。後來又多看點關於這類的書，作了一本「社會主義粹言」以紓已意，用謄寫板印了數十份送人看。

此後又有變動，變到佛家思想去了。當時想考留學生，須回廣西應試，路過南京下關。當初的下關非常繁華，我跟着同伴寓在江邊第一樓，房錢每人每天一元五角，飯還在外面。這種奢華的生活，我很不願意，並且舉目都是些難堪的境象，但是沒有法子，我就去睡，而笙歌盈耳，鬧得天翻地覆，又實在睡不着。這時候心裏煩惱得說不出來，又幾乎要自殺，幸虧又有一個朋友把我救了。因此忽然覺得社會主義還是不中用，一轉而入佛家思想。這也真能支配我的一切行爲，種種戒律都守得很嚴。從此就專研佛學，以至現在。所以沒有入別的学校也就因此。

以上講學校一面，現在講家庭一面。我幼時最爲先父所愛，說我有志氣又誠實勤儉很像他，替我取了一個名字叫「省吾」。只有轉入佛家思想以後所發生的不婚之念，是最失父親歡心的一件事。但我却認得很清，只能堅持不願。但現在想起來，這還不算；頂不好的還有一件事，就是常常同他老人家爭吵。因

爲我同我的先父都富於爲人的心，終日留意與己無干的事情，常常因政見不合，互相大吵，因此亦深滋他老人家不悅，今天想起來，還是很難過的。但因此可見先父那種很優容小孩子任其自由發表意見的態度，真是父親對待兒子最好的態度。

我同家兄性情也不相合，我常常同他鬧，去年還是這樣。但是他雖然是一個很利害很有本事的人，却是對於我從來沒生過氣，很優容我。我直至今年才覺悟一點，知道他待我真好。因此我覺悟能使人生活舒暢的，最重要的是家庭樂趣，就是孝弟，孝弟最能培養人的情感，舒暢人的生機，我覺得其中有無窮的妙處。但現在兩親都已不在，只好在弟字上做工夫了。所以我現在對於家兄，非常的愛他，因此在家中亦非常的和樂。並且從此對於外人，也覺得都很和樂可觀了。

印度佛教與流傳到外國的佛教之不同

在山西大學講

佛教從印度流傳到中國，從中國又流傳到日本。大約流傳在外者，以中國與日本爲最重要，其餘如高麗暹羅等處也有，但不甚重要。因爲各地的民族性不同，故其佛教也畧有變動。即如中國現在所流行的佛教，已全非印度之舊。印度的佛教大約以小乘爲根底，大乘是小乘進一步的說法。但是到了中國，只一點小乘的學問，如不久就衰落的成實宗俱舍宗，都是以講大乘教的人講小乘的學問，真正的小乘教簡直沒有，與印度之雖講大乘而以小乘爲根本者全不相同。又在印度雖是性宗相宗對壘，然其關係非常密切。一到中國就劃分得很清，發生十三宗派之多。

如禪宗即全非印度所有，是中國自己開闢出來的，禪宗這種東西在印度只有個人的遞相傳授，並不成爲一宗，亦無開堂等事。我們雖然不能說從佛到二十八達摩沒有這種傳授，但其做法都是確無可考。他們自己並沒有這種宗派，而中國則爲之巧立名目。叫做教外別傳，唐宋以來，幾乎要拿他代表全盤的佛教，

實在是根本上的誤會。宋人明人所說不絕口的釋氏，只是中國產的禪宗，他們並沒有看見印度原來的佛教。有人說陸王近禪，其實即使近禪，亦不能算是近佛，這不可不明白。

還有淨土宗，他的經典印度是有的，而專門偏重做一種念佛工夫，却非印度原來的風氣。又有天台宗華嚴宗，所有和尙講經的事，都是這兩派居多，雖然各有其根據的經典，但其所講的一套東西，全非印度所有。

以上是舉事實。我們再就兩方精神的根本不同說一說，這不同是由於民族性的。中國許多新創的佛教，根本上是不對的。印度民性誠樸，只是實實在在的根據事實。這種事實是感覺理智所認知的，而中國人則最長於以直覺體會一種意味。意味不是事實，是事實以上的東西。中國人因為自己喜歡講幽玄奧妙的道理，以為佛教也是幽玄奧妙的，這實在是根本的誤會。即如普通流傳的金剛經中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」他們就以為妙不可言；其實這完全是客觀的事實

而他們總以爲是奧妙的意味。宋明人喜歡稱引的「明鏡亦非臺」及六祖「風動旛動」之說，也都還是事實，並無奧妙。再看華嚴宗，十玄門的宇宙觀，亦是說得堂皇圓融而不剗切質實；天台宗也取龍樹偶語中的，「定」「做」「中」，「翻了許多花樣」。

中國所有一點真的，只有玄奘在印度用了十七八年工夫，然後搬運回來的法相宗。就是小乘的學問也都靠着他才能講，如因明學即完全要用理智，非直覺所能爲力。但因不甚投合中國人的脾胃，所以只有新到一時盛行，不久就衰歇了。雖然後來明朝還有幾個和尚講求。但都不免有錯。現在最可慶幸的，就是南京有一位歐陽先生能够直接唐代，能真得印度之真。其所以能如此，因其人頭腦最長於理智方面，少年時即喜自己精研數理。所以他去看佛書，就深入此途，恰巧日本又有很多的書，可以供他的參究。

日本的本願寺一派與中國的淨土宗是同派，所不同者，本願寺可以娶妻食

因而淨土宗不許。這或者是因爲日本人口稀少的緣故，不能不有這種通融。還有日本的和尚很帶武士道的采色，在古時常械鬪，也是與佛教精神衝突的。就如現在本願寺的大僧正，即很有野心，絕不像一個佛教徒。

我們所應當知道的，即在未明佛教內容以前，應當先持研究的態度，注重客觀的事實，考察其何者爲真，何者爲假。研究與信仰不同，信仰可以不管他是真是假，研究則必須考察清楚。西洋人及日本人很多做這種工夫的，專從歷史，語言，金石種種方面，考證事實的真相。照我的意思，現在應當有人，從教理上去做研究的工夫，這也是很必要的。在這一層，南京的歐陽先生很可爲吾人的指導者。

如何奠定現在的國家

在法政專門學校講

照我個人的思想，本來是很傾向無政府主義的，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後面，已經略見其端。我以爲政治很多是冤枉的事情，政府這件東西，很少真

實的必要。這有一種很根本的道理，爲我所深信的。但在現在，只能講一講眼前的局面，這種主義還談不到。

兩三年來大家很有一種風氣——最近已稍差一點，——就相尙不談政治，就是以前最熱心政治好作政治活動的人，也都這樣，以談政治爲不合時宜。這雖然也稍有一點理由，但多少是不對的。像清末那樣所有稍有才力的都羣趨政治一途，固然不好；現在一變而向教育及學問一面去致力，當然是好現象，却是究竟變得太過一點。我以爲大家的力量不應都用在一面，應當各幹各的。我們固然不願意將致力於教育或學術的人都拉到政治這邊來，但是設法將目前毫無政治可言的亂象，略爲條理，使之稍稍寧帖，也實在是必要的急事。

山西這方面，無論如何，我們總可以讚美地方政府有一種維持治安的功勞。別的地方，如廣西，廣東，湖南，四川，陝西……那處不是民不聊生！連我們最低要求的生命安全還保不住，還講什麼別的權利！所有革命所爭得的參與

政權及個人自由的權利，全被剝奪無遺。就是堂堂首都的北京城內，這幾年來，軍人搶劫繁盛市區的事，已經數見不鮮。北京的市民遇見口操奉音的軍隊，簡直像被征服國的人民遇見征服國的軍隊一樣。這種怪現象是從來所沒有的，然而堂堂的所謂中央政府，簡直毫無辦法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別的都且慢講，先去開闢出一條活路，是最首要的。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問題也就非常的重要。

我從小對於政局就很留意，十幾歲時，正是清末立憲時代。到民國以後，因為傾向佛家的學問，對於政治的注意稍差一點，但是切大變動的經過，都還清楚，可以詳述無遺。雖然我對於政治一邊的學問，後來沒有繼續研究，但是我有一點很可自信的觀察。

現在很清楚擺在外面的，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面。這是我在家裏眼看他一天一天長成的。這最大的過錯，在一般的國民。至於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，却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，他們無論如何，不應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。二次

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爲政爭的開端。從此以後，凡是要爲政治活動的，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。二次革命的時候，南方政客運動南方軍人，北方政客運動北方軍人。後來項城帝制，黎段不和，張勳復辟，及復辟之推翻，無不借助武人，幾乎沒有武人，便不能達政治的活動。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增長，到現在而達極點。就是當時有幾個真是好意的政治家，因爲要活動而去利用武人，但是結果是自己的範圍愈弄愈小，終於完全成了武人的世界，這是我們目睹的事實。

但是大家何以一定要如此呢？這有一個原故。照我看去，還是他們腦筋太舊。雖然根本上革命派及立憲派，多少總對於將來改出來的政治，國民有一種參與之權，多少總算是大家商量着走的一條路，而不是由一人去獨攬大權的。在理他們對於此點，應當認得很清。但是一到要費思索的時候，他們腦筋一轉，總是轉到舊路上去，就是「怎麼樣可以用我的兵力勘定天下；勘定以後，方

可說到政治的改革。「不必說後來的段祺瑞是如此，就是當初確有改革政治思想的人也都好這樣想法。黃克強想用兵力維持約法，亦就是一個根本錯誤。法律絕不能受特殊勢力的干涉，却也不能受他的維持，因為如此便根本上出乎法律的軌軌。最初出軌道的，不能不說是黃克強。他也始終未曾認清這條路。他很應該如此做法。這是因為革命家多是頭腦簡單的，姑且不說，就是立憲派的梁任公輩總算頭腦不簡單，但據我們所知，他們也很對不起我們的國家，他們也用這種出乎軌道的手段，完全沒有想到，必不能於平定以後將他所利用的武力重復納於軌道之中。梁的頭腦絕不簡單，但是他總想在這一點不妨稍稍放鬆，可以在此以外做點事情。殊不曉得，這根本大法是應當絕對尊重的；其尊重要同專制政治之絕對尊重君主一樣，如果稍一放鬆，根本就要局面翻轉。

上面所說是對於政治有力量的人的錯誤。其實最大的根本錯誤，還在一般的國民身上；雖然他們不曉得，却是不能不負這個責任。他們對於這新的路子

實在太漠視，以國事爲與己無干，對於個人自己的權利也太看得不重要。對於參與國政及個人自由的太少注意，實在是使我們無法去走新路的根本原因。結果當然是少數有力量有才畧的人，大家都想借着這個制度掠奪政權。他們搶着要充國民代表，而國民則始終不去聞問。其實只要國民大家稍加注意，出頭說話，其事即了。除非國民出頭，那種假冒民意掠奪政權的局面決不會完。大家沒有一種過問及爭持的態度，國家的奠定簡直無從說起。

過去的不必說了，如果從今以後，對於新的路子仍舊不認清楚，這就還是沒有辦法可以去走，而一方面從前專制的舊路又已斷絕不能再走，那末，大家只忍氣吞聲讓這種亂象自由的繼續下去罷了。

這個根本的原故，還是東西文化的不同。西方文化總是向前去下手；中國文化只是求之於己，持讓人的態度，所以對於在上的威權沒有抵抗的意思。中國人如果永遠走這條文化的路；永遠不會弄好。以前雖有革命的一個機會弄來

一條新路，因爲大家不加注意，所以始終不曾走好，弄得現在這般光景。所以必須根本將文化改變，否則沒有法子往下去走。

雖然歷來也還稍有這種要求與運動，但都視爲有利而不視爲應當，以爲利而不以爲義。這根本含着一點危險；却是也含着一點西方態度，因爲東方向來不尙言利而只言義。當初清末預備立憲的時候，即以爲如何於皇室有利，如何於國民有利的話，互相號召，而不視爲是一個完全人格所應具備的必要條件。他們不使國民有「應該如此」的覺悟，而只使視爲有好處的。如果認清其爲應當，即只有絕對尊重，沒有什麼可以商量的餘地。然而當時的政治活動家何嘗懂得此理，我們至少也可以說他們都有想藉此以施展自己才幹的私貪。但是即此一點，已經就很不對。如果是不應當，就絕對不能放鬆，而大家則總喜圓巧，我便宜，結果還是並不巧，並不便宜，完全上當。

所以現在最重要的，在如何使一般國民採取西方要求的爭持的態度，而一

方面還要守定我們固有的一個舊態度，就是視爲應當——義——，是爲要求人格的完全，而不視爲利，果然能够爲此，或者可以勉去以前兩樣危險，而奠定我們的國家。我以爲這實在是我們學政法的同學應該注意，應該努力倡導的。

如何可以使人的行爲合理

在農業專門學校講

我們最合理的（我可不願意用「善的」「道德的」等等名詞，因爲似乎帶點特別的意味）行爲如何才有？我以爲這出於愉快的心理，是很自然的心理。這所謂自然，對待不直接的動作而言。不直接的動作是有所爲的，自然的是直接的，無所爲的。譬如慈惠的心理，完全由表的說話，即是純順自然，毫無所爲的。心裏想要去怎麼樣，而後怎麼樣，便是不自然，不活潑，生機凝滯的時候。生機活潑調暢毫無所爲的生活，是自然的愉快的；這別人稱爲道德的或是善的，我稱爲合理的。如果要使人的行爲合理，全在培養愉快心理。一切嚴重教訓，以利害威迫人不得爲惡或引誘人使之爲善，都根本上與人的生活不生關係，

並不能使人變惡爲善，而反給人一種不良的影響，就是傷害人的生機，妨碍心理的愉快。妨碍了人的愉快心理，即可發生很多的惡行爲，根本是不對的。大家又喜歡使人自己時時警惕，悔過，洗滌舊惡，這種時時注意自身罪惡的辦法，也很不好。我總以爲最好是着眼到自己的好的一面，不要去理會那壞的一面。

我未來山西以前，看見許多關於山西「洗心」「自省」的印刷物，辦法都不大對。到太原以後，第一次在督軍署大自省堂，一進門就看見四個大字「悔過自新」，很使我受一種特別的激刺，很不愉快。這種辦法，很省克自己，很嚴厲去管自己，其結果終不能使人跳出過惡的圈子。固然，山西這樣設法使人如何變成好人，在別的地方是沒有人理會的，我們當然應該讚歎，不過作法的確是不對，我們也不能不說。這種過于刺激，過於緊張的空氣，即使偶然能收效一時，也決不是長久的。只有合常理的是能長久的；不合常理的不但不能長久，

實在全無效力。

所以如何培養人的自然的愉快心理是很必要的。

中西醫學比較觀

在醫學傳習所農業專門學校講

我廿二歲曾一度喜看醫書，中醫西醫都看。在未看以前，我的意思以為，人體是中西一樣的，有病的時候，同要醫治這個肉體就是了，中醫西醫既都是治人體的病，當然研究的結果可以得其會通。我就很想去作這件事。但是看過之後，曉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完全不能相通。丁福保所說的中西醫通，全然無當。一種學術的根本在方法，方法不同，即無可通融；結果上偶然相同，不得謂之可以相通。丁福保即以兩方用藥的相似或偶同而得同一結果謂之通，這實在不能算通。如同一藥物，中醫囫圇著用而西醫則用化學方法提取有效成分，即使中國藥品統為西醫所採用。也不能說是西醫用中國藥，因為根本上方法不同。西方一切文化，都走科學的路，其講人體講藥物也如此。中醫只用玄學

方法，根本上不能得西醫的承認——只是關於一句話或一種藥物的承認不算。一定要根本上他的方法可爲西醫所採擇或至少可以商榷的時候，乃可說到融通。中醫看人是一個整的，西醫則尋覓病灶。中醫說病是全身有一種不調和或偏勝；他的用藥即是求其調和。西醫則只對病灶而治，故多用手術。在學問一面無論如何不能說西醫不可靠；他完全根據事實，有客觀的一定道理。至於中醫呢，不但我們說他不可靠，就是他自己也不甚信任自己；他是藝術的精神，不管客觀的定理。同是一種藥，對於他的藥性，即人各一見，互不相同。但事實上有時中醫效力並不遜於西醫，這或者是他的方法中還有可取之點，所以我們也不敢任意菲薄。然而這一點好的方法，一天不能明白使大家公認，即一天不能在學術上取得地位。反過來說，西醫方法那麼謹嚴，而效用有時不如中醫，也是因爲他的方法有一種毛病，就是把人看得太機械了。在這一點，中醫却不如。如吐血一症，西醫總是收斂，用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的辦法，中醫則較有

想去根本療治的意思。西醫在學問上分別得非常之細，而治法常似嫌其太簡單。所以效用不能說中醫較劣，而學問上則的確西醫占勝。現在最重要的，是有人先精研生理解剖病理諸科學，再來精研中醫，而於其方法上的溝通有所發明。

吾人的生活與家庭

在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講

我在這個題目之下所要表白的意思，多少與東西文化的研究有點關係。東方很重視家庭，並且似乎嫌其太過，而西方則比較很差。東方人的個性很少一種伸展，個人算是家庭中的一部分；西方則個人獨立，所以家庭不甚重要。但是中國人那樣個人埋沒於家庭之中，甚至連國家都不理會，也是太過。今天所要說明的，就是，在文化變遷中，家庭要變到什麼樣子，雖然尙難斷定，但是據我的觀察，像中國這樣的重視家庭，是很合變遷潮流的。因爲近世人類生活的變動，從十六十七世紀開發下來的西方文化，到了現在差不多根本上有一種

變遷，而中國這種重家庭是適合這個變遷的。

原來西方從希臘起，即可見其理智的發達。如梭格拉底說「知識即道德，」即可見其對於理智的重視。從那時起，西方人講倫理，講人生的思想史，無不重在理智方面。梭格拉底那些弟子及當初許多思想家都如此。到文藝復興時代，大陸上還是照舊，英國則更偏功利，以為快樂利害的計較，亦是道德的根本，就是所謂功利主義。但是這個分別計較還是理智，與前還是一貫，其所不同者，即在稍重利害一方面罷了。因為他們思想如此，其生活也確有這種傾向，分別計較的心理很盛。這種理智活動最盛的時候，最宜於個性伸展，因為都帶着物我彼此的分別。他們對於自然界持對待反抗的態度，而對人亦然。此即因先認識自己，分別人我，是理智的活動。結果雖然可以克服威權，得到個人的自由；但是到現在西方人已經很感一種苦痛，因為個性伸展到極處而人的生活太機械了。這種現象全歐美都如此，而英國最甚。中國人最尙情感，父母對於

子女，子女對於父母，就是兄弟朋友之間，無不是因愛他而忘了自己，很不把自己當一回事，很有無我的傾向。西方很重自我，一切都不退讓，雖然因此而得自由，但是人與人間太乏情趣。中國人很重屈己讓人，人與人間有一種溫和的態度，很有情趣，比西方那樣連家人父子之間，都持計較算帳的態度好得多！人的生活確是很有待於情趣的培養的。現在西方人那種生活太少趣味，太使人不能忍耐。照我的研究，中國文化澈頭澈尾是一個直覺的，雖然缺乏個性的申展，不能發生德莫克拉西，却是富於情趣，是其特色。直覺與情感是異名同實的。

現在講此刻的變化。西方人學術思想上有根本的變動，是科學的變動。這所謂科學的不同，尤其是指心理學而言。現在的心理學與前大不相同了。從前的心理學以意識爲重，完全重視理智一面，而於本能的情志方面很少留意。最近的行爲心理學，就留意到情志方面來了，其方法也由分析的變到看其活動之

勢的了。到此，他們才曉得，人類生活的惟一源泉，是情志而非理智。要一個人好，不在乎使他明白，而在根本使他的情志方面好，就是說有知識不一定有道德，這是西方心理學上最近的一個大翻案。知道增加知識不一定能使人好。他們一面受了理智過量發達的痛苦，一面又覺悟了從前以理智發達為道德基礎的觀念之錯誤，根本上就使他們很着意於中國人所沒有丟掉的人生情趣。

要使一個人好，在培養人生的情趣，而培養情趣最好的地方是家庭。家庭是人的用情所發端之處。一個人不能與家人無情而與外人反到有情。家人間的情趣是情趣發生的起頭，最能使人快樂。時常有情趣，即時常快樂，心理也就常常的好，決不會發生不好的行爲。不好的行爲，都發生於不愉快的心理。有情趣培養的人，很少有對不住人的行爲。我們一面看西方人的新要求，一面即可看見中國的注重家庭，真能使人增加情趣，都是很合潮流的。

孔子沒有別的道理，就是很讓人着重家庭的情趣。這就是近來愛講西方化

者所不願聽的「孝」「悌」兩個字。這兩個字實在有無窮的妙處，可惜沒有人用現代的學理去研究出他的真義。這兩個字誠然不能發生個性的伸展，不合於近代的西方化，但是要曉得，假使你留意到西方化目前的變遷之所趨，再能認清這兩個字的真義，便不能不承認他們是自然胾合了。

中西兩方教育所注重之不同

爲陽曲小學教員講

記得辜鴻銘先生一本講中國文化的書裏，說西方教人以知識，中國教人以君子之道。中國能否當得起「教人以君子之道」這句話，雖然還是問題，但總算是偏於這面的。照我看，西方確是偏於知的方面，中國則偏於情的方面，爲孝悌。昨天在督軍署就說到這個問題，當時有人主張二者都不可偏廢，我以爲這確是完全的教育所必要。現在就說說這個問題。

知識成了系統即是學問。學問有不假經驗的，如純用推理方法的數理；普通則多在經驗一方面。我們所學於人的或教給人的統統是經驗。我們無論如何

，的確不能不承受前人所遺留的經驗，否則事事都要由各個人去重新瞎碰，太不經濟，太苦。所以教育上沒有法子可以說不重知識，只重人格。差不多嬰兒初生，他的完全人性已經具備，而知識方面都不能不經過教育。對付問題不能不取決於前人的指教，我們個人的知識很少。這一點西方人最能做到好處，所以產生科學，科學成於前人經驗的累積。自然界問題取決於自然科學，社會問題取決於社會科學。有人要排斥知識，純講率性與直覺，很不對。這是中國人的脾氣，他很不相信前人的話而信其個人的意見。中國此刻的自然科學，是來自西方的，原來沒有什麼科學，總都好任憑個人當下的手腕與心思，太不注重知識，這種辦法太乏繁密的知識，很少精細的審量，最容易把問題看成太簡單。所以中國人不相信科學，也就沒有科學，只是一種藝術的精神。如中醫有許多派別，各憑個人的感想而無客觀的公認道理；西醫即完全與此相反。中國教育的太不重知，無可諱言。所以現在我們應當對於以前的短處有一種覺悟，

以後對於知識應當注重。好在現在學校多做西法，這一方面還沒有什麼忽畧。

現在說情的一面。這一面中國向來即很重視，是一種好處，我們應當注意保持勿失。小兒初生，其人性即很完全，所以這一面的教育與知的教育根本不同。知識除了純理科學以外皆從經驗得來，是由外面給他的。情的方面則只要在不去傷害他本有的好處，引導他自由發展出來，是由內而外的。但從來許多的辦法都很容易妨害他，例如賞罰。賞罰是利用知的方面一個計較的心理，使人因賞而爲善，因罰而不爲惡，或是貪，或是避，最妨害情的心理。知的心理與情的心理是迭爲起伏不相並立的。

人的行動，在以前西洋人以爲出於知的方面，純受知識的支配。梭格拉底說知識即道德，以爲人只要明白，他做事就對，幾乎至今西方倫理學說還有這樣色彩。後來英國派主張行爲當取決於計算的結果。現在有一種新的翻案，說人並不能計算利害，知所趨避。這是科學的發見，心理學上說人類雖然比其他

動物多一層知識，但根本上還是以本能爲底子，人的行爲好多是盲動的，無目的的，無計較的。計較實在不能支配行爲，我們常多是趨害避利，並不能趨利避害，因爲他實在不能認識。要人得合理的生活，不應以知的方面妨害情的方面。如賞罰的結果即只能擾亂他自己的生括，並不能爲吾人的希望，使他以知識支配行爲。除了順着本能，調暢情的方面，更無別法。

賞罰是一端，還有一端就是大家總好以乾燥無味的辦法去教訓小孩。即如教他應該孝，還是屬於知一面的，根本上不能使他由不孝而一變爲孝，因爲不能使他情的方面有所變動。情的教育，不必告訴他一篇話，只要培養他的情趣，使他自己的真情自由發揮出來。不要妨害他，引導他由內發出。小孩子是最多情的。雖然好的行爲不是簡單可以說明的，但是有人說道德發於同情心的話雖不很對，總可以說是一種好的行爲的根本。這同情心是小孩原有的，只要能順着調理他，幫着他發展出來，我們所做的事已經不小。因爲賞罰而去爲善或

不作惡的小孩，我以為是根本不可教的；能夠反抗賞罰的，本能的力量還很強，不受外面的擾亂，倒是很有希望的。

今日的中國與工業

在工業專門學校講

照我們看去，以前中國文化在工業方面非常欠缺，只有憑藉手足之力的簡單工業，科學的工業完全沒有。這固然因為對於物質方面太忽略，也因為對於精巧的製作素來排斥。西方征服自然的文明，即是工業的文明，輸入中國雖然不多，已可見其大概。在西方，自然界全憑人類處置，實驗派說「自然界像一個柔順的女郎，任憑我們怎麼樣去裝扮他」確是不錯。這因為西人很注重物質的享用，其物質方面的成就也非常之大。有人說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，雖不很對，但其成績上却是的確如此。我的朋友林宰平先生新近從歐美回來，他說，在中國聽到物質文明四個字，等到親遊歐美方得此四字的真解，他們的物質享用真非中國人所能夢見。中國人的儉樸固然是好，但處此交通之世，這種儉樸

能否永遠保持是一個大問題。如果在物質生活不能永保儉樸的態度，而自己工業又如此的不發達，這多少是一件危險的事，我們物質方面的缺乏，是無可諱言的。

現在中國人對於工業，雖然注意的程度不大相同，但可說決無人以為不必要。也有人說，中國是農業國，衣食比奢侈品重要得多，應該專注重農業，如閻督軍就持此說。這話固然不錯，中國以前是農業國，以後怕還是農業國，而工業發達的結果易增奢侈，這也有點道理。但是我們以後的農業恐怕也不單是以前那樣簡單的農業，如果真要發達農業，也還是要靠科學的工業之助。以前那樣單靠沒有多大氣力的手足及天然的風雨氣候的農業，完全是靠天吃飯，一有災，毫無辦法。所以就是要發達農業，所需要的器具機械及農業化學的學問，也非先發達科學的工業不可。況且我們雖然不必要許多奢侈品，但也有許多必不可省的日常生活是應當要求的。我們現在很覺得沒有能力可以使我們的

日常生活稍爲舒展一點。照舊日的看法，以爲就像現在這樣的生活還過不好，那裏還應當有再高的要求，這種見解是一個錯誤。要知道單靠手足之力，自然是力倍功半，如果用科學的工業，即可用力少而出品多，並且出品的質也能較勝於前，很容易使我們的日常生活漸漸舒展。

再講如何開發科學的工業。普通人很早直到現在都有一個意思，以爲中國工業的不發達是因爲沒有人才，所以要先從培植人才入手。但要曉得這幾年來還有另外一個根本上使工業人才不得發達的原因。現在時常看見許多工業人才都沒有相當的職業，讓他們去教西文或做官，甚或連不相當的職業都不能得。如此不能有所發展，就是多立工業學校也沒有用處。就反面說，如果社會上工業發達，工業人才自然成了需要。供應與需求是互爲因果的。這個根本原因不能說不在政治。工業發達的條件，一面是科學，一面是經濟。西方的工業發達，一面固因大機械的發明，一面也靠經濟情形獎勵科學，使之對於工業有繼續

不斷的貢獻。當初那些分工，自由競爭的辦法使經濟自由發展，所以只要是利於生產的機械發明，就很蒙社會的鼓勵，而一方面經濟也因工業革新而日益發達。中國近年的政治很使經濟情形很枯窘，很不發達。前幾年我到湖南，看見那邊鑛業非常發達，一個華昌公司的錫鑛，其一年的收入就可抵得全省一年的對外消費額。但許多鑛都是輸出外洋的，現在連年戰爭，不但不能開鑛，就連已經開出的也不能往外運輸。因此鑛工不能生活，同鑛有關係的種種商業也都停閉。如此直接使工業停頓，間接即使經濟大受打擊，那裏會還有餘力去經營別的工業。這不過舉一個地方做例，如果全國都永遠在這種變亂局面之下，資本家不敢投資開發工業，工業當然不能發達。所以無論從那方面看，政局的改革，社會的秩序，的確是根本的必要。這個責任不在軍閥，而在一般國民太不注意政治，不能克服軍閥。這是因為說工業而聯想及此。

如果國家安甯，我們去開發工業要用什麼方法呢？西方有兩種方法。一種

是資本主義的方法，就是利用人好發財的心理，去獎勵工業的開發。亞丹斯密及司賓塞都如此主張，是爲資本主義的工業。但這個辦法到現在西人很感痛苦，成爲社會上惟一大問題，因爲他只顧生產，不問消費方面的情形，以致生產過剩，工廠停閉，工人失業，造成經濟恐慌。生產雖多而不得衣食者也多，發生種種不利及罪惡。這一條我們當然不取，要設法避免這種弊病。現在留心的人多已注意及此。所以將來究應採用西方的社會政策呢，還是根本採用社會主義，是一個很應商權的重要問題。但是資本主義工業的辦法，決不能再用，是可斷言的。我們以前工業雖因不及他們而吃虧，但因此可以不走西方的覆轍，也未始不是便宜。



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出版

筆記者

陳

政

發行者

山西省教育會

印刷者

太原晉新書社

寄售處

太原晉新書社

梁漱溟先生講演錄
每册定價大洋一角

337033

一九六四年四月廿三日
山西省人民教育出版社贈

